

## 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别集类札记

癸 斌

清代乾隆年间修订的《四库全书》对所著录的图书一一撮其大凡，撰为提要，遂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以下简称《提要》）《提要》除对书籍的版本、大旨、得失进行一番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夫外，其余便是对作家进行简略的评论。这些看来颇为零碎和各自独立的评论，却也体现了《提要》编纂者的文学观念和批评眼光。本文不可能对这些评论的准确性一一进行辨证，因为这项工作所要化费的劳动太巨大了。我们只是就别集类中楚辞类至宋人别集的部分提要，综合概括出《提要》编纂者评论作家的几种方法。这些方法对我们理解或批评一个作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一 知人论世

孟子开创的“知人论世”说，是评论作家的不易之论。《提要》严格地、始终一贯地遵循这一原则，并把它作为评论作家的首要条件。《提要》总目凡例说：“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又说：“未知其人之始终，可定其品之贤否乎？”一个批评家倘若连所要评论的作家的生平、经历都不很了解，那么他无疑等于说梦。《提要》为了使自己的评论有事实的依据，常常对作家的经历进行必要的考订，所谓“徵实之谈，终胜悬断。”<sup>①</sup>如在《扬子云集六卷》提要中，对扬雄仕王莽一事进行了必要的

考证。这个考证之所以重要，在于扬雄的仕莽与否对于评论扬雄关系甚大。焦竑的《扬雄始末辨》考证《汉书》所载雄仕莽作符命投阁，年七十一，天凤五年卒之说，与事实不符，因此得出“谓雄为仕于莽年者，妄也”的结论。“近人多祖其说，为雄讼枉”。《提要》为此进行一番考订，证实天凤五年扬雄正得七十一年，与《汉书》所说的七十一卒之数相合。因此，“其仕莽十年，毫无疑义”，焦竑的结论是错误悖谬的。

《提要》考证的地方很多，这固然是清代学问注重考证的表现，但事实上研究和评论一个作家，特别是古代作家，必要的考证是不可废弃的。

知人论世的另一方面是尽可能清楚地了解作家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感情。形成作家的个性和作品的风格，有多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作家的经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作家的痛苦和欢乐。

《提要》评论作家时，十分注意其生平经历。如评论唐代诗人卢照邻，根据《唐书文苑传》和诗人的作品，以经济的笔墨勾画出诗人穷困潦倒的经历，然后得出结论说：“盖文士之极坎坷者，故平生所作，大抵欢寡愁殷，有骚人之遗响，亦遭遇使之然也。”<sup>②</sup>从作家经历遭遇出发来说明作品的特点，无疑是正确的批评方法。

知人论世的再一个方面是探求作家的生活环境和社会交往，并以此来说明作家的作品特色形成的原因。如《蒙隐集》《提要》评其作者陈棣说：“棣诗乃于南渡之初，已先导宋季江湖之派，盖其足迹游历，不过数郡，无名山大川，以豁荡心胸，所以唱和者，不过同官丞簿数人，相与怨老嗟卑又鲜耆宿硕儒以开拓学识，其诗边幅稍狭，比兴稍浅，固势使之然。”<sup>③</sup>这段话说明一个作家生活环境的闭塞和社会交游的狭窄，会怎样影响其作品。相反，宋代作家周行己和章甫，因为社会交往的宽广，作品就呈现另外一个面目。如评周行己说：“行己之学，虽出程氏，而与曾巩、黄庭坚、晁说之、秦观、李之仪、左誉诸人，皆相倡和……于苏

轼亦极倾倒，绝不立洛蜀门户之见，故耳濡目染，诗文亦皆娴雅有法。尤讲学家所难能矣。”<sup>④</sup>《提要》所说的“耳濡目染”，指的正是同一个文学集团或不同文学流派作家间的相互影响。这种将作家的生活环境、交游经历同文学创作联系起来观点，也是古代作家常有的。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就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荡，颇有奇气。”许多古代有名的作家浪迹江湖，交游天下，这对他们的创作确实产生非常深刻和有益的影响。

## 二 重人品与胸襟

《提要》评论作家时，很注重作家人品高下和胸襟雅俗。“诗品文品之高下，往往多随其人品。”<sup>⑤</sup>这是编纂者们的基本看法。他们将人品低劣的作家的作品打入另册立“存目”中，表现出鲜明的褒贬意味。当然，他们的褒贬并非都是客观公正的。因为本来《四库全书》的修订，清王朝就有政治目的：既借此博得崇奖学术的名声，又可对反清文献和不需要的书，进行销毁、删改或只存其目。此外，纪昀等编纂者大多是尊崇汉学、轻视宋儒的。在阶级偏见和学术偏见的支配下，不可能对所有作家作出完全公正的评论。但无庸讳言，《提要》对大多数作家的评论是准确或大致准确的。

《提要》评论作家时对人品高尚者大力赞赏，对人品鄙劣者报以鄙词，这种例子随处可见。象称赞范仲淹“人品事业，卓绝一时”。<sup>⑥</sup>对民族英雄文天祥更是推崇备至：“天祥平生大节，照耀今古，而著作亦极雄贍，如长江大河，浩瀚无际……”<sup>⑦</sup>相反，品格鄙劣者，如姚广孝和严嵩，在总目凡例中就成为示众的对象，把他们的作品打入另册。

这里尤可注意的是，《提要》为了达到“以垂警诫”的目的，对一些偶有过失的作家，也毫不忌讳地指出其瑕处。这种实事求是评论作家的态度无疑是可取的。如评陆游，对他的著作之

富，锻炼之工充分肯定，但也并不因为他是南宋有数的大作家而讳忌他人品上的那怕微小的瑕处，从而作不符事实的无原则吹捧。《提要》把杨万里和陆游作了比较：“游晚年隳节，为韩侂胄作《南园记》，得徐从官，万里寄诗规之，有‘不应李杜翻鲸海，更羨夔龙集凤池’句。罗大经《鹤林玉露》尝记其事。以诗品论，万里不及游之锻炼工细，以人品论，则万里侷乎远矣。”<sup>⑧</sup>陆游是个公认的爱国诗人，他为韩侂胄作了《南园记》，是否人品就当远在杨万里之下，对此不作辨证。我们所着眼的只是《提要》对作家人品的重视和实事求是的作法。

文如其人。作家高尚的人品和超俗的胸襟，一般来说与他们的作品是统一的。（当然，文学创作是十分复杂的现象，作家的思想品质和作品之间有时会呈现明显的矛盾。）《提要》常常用作家的人品胸襟，去解释其作品的风格或者优劣。如评唐代诗人元结说：“结性不谐俗，亦往往迹涉诡激。……然制行高洁，而深抱闵时忧国之心，文章戛戛自异，变排偶绮靡之习。”<sup>⑨</sup>评张詠：“……特其光明俊伟，发于自然，故真气流露，无雕章琢句之态耳。”<sup>⑩</sup>评魏野：“胸次不俗，故究无齷齪凡鄙之气。”<sup>⑪</sup>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作家有了高尚的情操和志向，才能写出优秀的诗文。《提要》评论作家注重人品的优劣，并以此说明作品的优劣，这是正确的。

但不容忽略：由于强大的封建传统观念，《提要》对一些作家的评论明显存在偏见。这就引起我们注意《提要》所说的“人品”两字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我们看《提要》怎样评论吕温和王安石。其评吕温说：“温亦八司马之党，当王叔文败时，以使吐蕃幸免，其人品本不纯粹。”<sup>⑫</sup>唐顺宗时期以王叔文为首的“八司马”，其实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革新集团。由于旧势力的强大和疯狂反扑，王叔文集团不久失败。历来的封建统治者，骂王叔文等是“斗屑小人”。《提要》继承了这种观点。因此吕温既然是“八司马”之党，人品也就本不纯粹了。《提要》

评王安石，则完全以朱熹的评论为依据。其文云：“朱子楚辞后语，谓安石致位宰相，流毒四海，而其言与生平行事心术略无毫发肖。夫子所以有於予改是之叹，斯诚千古之定评矣。”<sup>⑬</sup>王安石是北宋神宗时代的一位革新家，历来的封建保守派给他加上许多污蔑不实之词。《提要》对王安石人品的贬抑，鲜明地体现了编纂者的封建正统观念。

### 三 结合文学史评论作家

《提要》评论作家，经常联系文学的发展历史，考镜源流，指出作家的继承渊源、当时的文学风尚，以及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史、论相结合的评论方法是可取的。每一种文学现象、文学体裁都有自己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把作家放到文学发展史的大背景下考察，作家的因袭和革新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如评论下面一些作家——

储光羲：“其诗源出陶潜，质朴之中，有古雅之味。”

韦应物：“五言古体，源出于陶，而镕化于三谢，故真而不朴，华而不绮。”

皇甫湜：“其文与李翱同出韩愈。翱得愈之醇，而湜得愈之奇崛。”

……

指出一个作家源出某某，始于钟嵘《诗品》。探讨作家继承渊源，因着作家继承前代文学遗产的复杂性，有时难免会有穿凿附会的弊病。但作家在向前代文学遗产学习时，确实普遍存在先向某一作家学习和模仿，然后博采名家所长，最后自成一家的情形。《提要》评论韦应物、皇甫湜时，既指出他们的主要渊源，又指出他们有所选择和突破，且用词较为谨慎，不把话说死。这样的评论是考虑到作家继承渊源问题上的复杂性和实际情形的。

一个时代的文学风尚给予作家的影响是极其深刻巨大的，即使是富有创造性的作家也难免不受一代文风的某些影响。因此，

要正确地评论一个作家，应当先弄清作家所处时代的文学风尚。

《提要》对某些作家的评论就颇有历史主义的观点。如一些论者颇非议王勃骈俪的文风，《提要》根据初唐的文学风尚，对前人的评论进行辨证，维护了杜甫的正确评价。其文云：“洪迈容斋随笔亦曰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骈俪作记序碑碣，盖一时体格如此，而后来颇议之。杜诗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湖万古流……”<sup>⑭</sup>同样，评论陈子昂也注意初唐文风。《陈拾遗集十卷》《提要》说：“韩愈诗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宗元亦谓张说工著述，张九龄善比兴，兼备者子昂而已。……今观其集，惟诸表序犹沿排偶之习，若论事书疏之类，实疎朴近古，韩柳之论，未为非也。”初唐时期，六朝俳偶绮靡之风犹盛，陈子昂当然不可能一点不受此时文风的影响。但他毕竟是文学上的革新家，论事书疏之类，已开古文运动的先声。这样结合文学史评论陈子昂，就得出符合历史的公正结论。

要正确地评价某个时代的作家，还应当了解这个时代特有的社会风尚。例如文人的生活习性、兴趣爱好。如《欧阳詹集》中有太原赠妓诗一首，陈振新《书录解题》力辨其诬。《提要》据《闽川名士传》和邵博《闻见后录》，说不能说一定没有作诗赠妓一事。其依据是：“盖唐宋官妓，士大夫往往狎游，不以为讶，见于诸家诗集者甚多，亦其时风气使然，固不必奖其风流，亦不必讳为瑕垢也。”<sup>⑮</sup>因此，即或有赠妓一诗，也无关紧要。《提要》对欧阳詹的评论，说明了解作家所处时代的社会风尚，也是正确评价作家的一个条件。在评唐代作家李邕时，《提要》以唐代士大夫信奉佛道的风尚，指出刘克庄评论的不公：“刘克庄后村诗话，讥其为叶法善祖作碑，贻千载之笑。然唐时名儒硕士，为缙黄秉笔不以为嫌，不似两宋诸儒，视二教如敌国。此当尚论其世，固不容执后而议前。”<sup>⑯</sup>文学史是门历史的科学，执后而议前，用现在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要求古代作家，除了说明批

评家的无知外，其结果必然歪曲古代作家。

《提要》在评论作家时，又指出他们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如《谢宣城集五卷》提要引用赵紫芝“辅嗣易行无汉学，元晖诗变有唐风”的诗句，指出谢朓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评庾信，则指出他是骈文写作的高手：“其骈俪之文，则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sup>①</sup>《提要》不是孤立地评论作家，而是从文学发展历史出发来把握一个作家，这样，作家的地位和作用就看得更清楚了。

在文学史上，一种文学体裁或文学流派的形成，往往经过不止一代作家的努力。对于文学史上成就不大但有开创之功的作家，《提要》并不抹煞他们的历史作用，而给他们一定的地位。

如评宋初作家尹洙：“……至所为文章，古峭劲洁，继柳开穆修之后，一挽五季浮靡之习，尤卓然可以自传……盖有宋古文，修为巨擘，而洙实开其先，故所作具有原本。自修文盛行，洙名转为所掩，然洙文俱在，亦乌可尽没其功也。”<sup>②</sup>大海浩瀚，倘没有百川归之，就不能成其大。给那些开某一文学风气之先的作家予应有的历史地位，这不仅是公允的，而且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文学的发展进程。

#### 四 以公正态度评论作家

曹丕《典论论文》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相轻的原因是什么？曹丕没有说。《提要》以具体事例，指出词场恩怨和门户之见所造成的文人相轻，以及由此怎样影响到评价一个作家。《提要》集部总叙说：“钟嵘以求誉不遂，巧致讥排。刘勰以知遇独深，继为推阐。词场恩怨，亘古如斯。冷斋曲附乎豫章，石林隐排乎元祐，党人余衅，报及文章，又其已事矣。”因此，正确评论一个作家，也应当考虑到各种偏见对他们的影响。

《提要》对宋代作家傅察，作出了新的评价，并透露了周必大和史传过誉傅察的内中原因：“周必大序，称文务体要，词约

而理尽，诗尤温纯该贯，间作次韵，愈多而愈工。史亦称其文温丽有体裁。今观其诗，古体学韩不成，近体亦乏深致，文则皆表启儷偶之词，不出当时应酬之格……，必大所云，盖曲徇其孙之请，而史又沿必大之文。”<sup>⑩</sup>在对作家评论问题上，不论古代或者现代，因门生故吏，至亲好友，或慑于专制主义者的权威，或虑于大作家的声名，于是作无原则的阿谀之词。这种例子很多。态度严谨的批评家应当扫除这种腐朽风气，力求对作家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准确结论。

过誉的反面是过毁。过毁也是不公正的表现。《提要》指出门户之见常会造成过毁。如《提要》评孟郊诗，说唐人自韩愈以下对郊诗都很推崇，而苏轼和元好问颇有异词。这是因为苏、元和孟郊艺术上门径不同。”苏尚俊迈，元尚高华，门径不同，故是丹非素。究之郊诗品格，不以二人之论减价也。”<sup>⑪</sup>确实，孟郊诗有它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万紫千红的唐词中，不失为一朵香花。

《提要》评论作家的公正态度，又表现在它评论作家时是以全部作品，而不是以某一时期的作品为依据这一点上。这种批评态度应该说是严肃的。因为许多作家的创作过程表明，作家的经历和思想感情在各个不同时期会呈现不同的、甚至相当复杂的形态。不读完作家的所有作品，仅仅根据选本或某部分、某一时期的作品，来概括作家的全部，便会妄下雌黄。《提要》评论作家颇能注意其不同时期的作品，不任意作极端议论，持论较公允。评庾信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庾信是南北朝后期颇有争议的一位作家。总的说，诋毁多于称誉。“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称徐陵庾信，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采，词尚轻险，情多哀思。王通《中说》，亦曰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令狐德棻作《周书》，至诋其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斥为词赋之罪人。”<sup>⑫</sup>前人的这些批评，其实只道出了庾信前期一些作品的特色。因此《提要》当即辨证说：“然此自指台城应教之日，二人以宫体相高耳。至信北

迂以后，阅历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则非陵之所能及矣。”《提要》评庾信兼顾到他后期的作品，避免了以偏概全的毛病。

《提要》评论作家时，常常讲到不以人废文，以人废言。这条原则对于正确评价作家很重要。作家常常属于一定的政治集团。有的即使不属于某个政治集团，也有某种政治观点。所以，文学或多或少同政治有些联系。正因为这样，所以有的评论往往以政治上的成败得失衡量作家优劣，或者以简单的政治思想的划分来代替细致的艺术分析。但事实上作家的政治思想（包括道德品质）与作品的关系非常复杂，远不如雕板和花纹那般简单。思想不等于艺术，人品不等于作品。既要把作家思想和作品联系起来，又要善于将二者区分开来。《提要》评论作家所持的不以人废言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把作家思想和艺术区分开来了。

宋代作家王珪，《提要》称其“人品事业，皆无可取，然其文章，则博赡瑰丽，自成一家”。<sup>②</sup>宋代作家华镇，与蔡京等人往来赠答，人品不足论，但“其所为诗文，则才气丰蔚，词条畅达，虽不足与欧曾苏黄比絜长短，而在元丰元祐之际，亦褻然自成一家，置其人品，取其文章可也。”<sup>③</sup>宋代作家孙覿，“怙恶不悛，当时已人人鄙之矣。然覿所为诗文颇工，尤长于四六，与汪藻、洪迈、周必大，声价相埒，必大为作集序，称其名章隽句，晚而愈精，亦所谓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也。”<sup>④</sup>以上这些例子都说明《提要》看到作家人品思想与作品之间的不一致现象，从而将二者区分开来。这样做是公正的，也是辩证的。这种不以人废言的评论原则，在某种意义上说，对我们今天的文艺评论工作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四库全书》编纂者的作家论，体现在全部《提要》中。以上仅仅是从《提要》很少一部分中综合概括出来的评论作家的一些原则或方法。因为用的是以小见大法，也许不能全然见其大。这

些原则或方法,虽然并非《四库全书》编纂者的新创造,但他们努力将其运用到作家的评论中去却是事实。至于一些评论妥当与否,另当别论。我们都有体会,具体运用原则比了解原则困难得多。了解《提要》编纂者们如何具体运用一些原则来评论作家作品,作为我们正确开展文学批评的参考,应该说也是一种有益的事情。

一九八一年一月修改

## 注

- ① 山带阁注楚辞六卷楚辞余论二卷楚辞说韵一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二年七月初版,页3094。(以下板本不再重注。)
- ② 卢升之集七卷。别集类二,页3117。
- ③ 蒙隐集二卷。别集类十二,页3344。
- ④ 浮沚集八卷。别集类八,页3269。
- ⑤ 佩韦斋文集十六卷。别集类十八,页3449。
- ⑥ 文正集二十卷别集四卷补编五卷。别集类五,页3197。
- ⑦ 文山集二十一卷。别集类十七,页3430。
- ⑧ 诚斋集一百三十三卷。别集类十三,页3186。
- ⑨ 次山集十二卷。别集类二,页3130。
- ⑩ 乖崖集十二卷附录一卷。别集类五,页3186。
- ⑪ 东观集十卷。别集类五,页3193。
- ⑫ 吕衡州集十卷。别集类三,页3146。
- ⑬ 临川集一百卷。别集类六,页3231。
- ⑭ 王子安集十六卷。别集类二,页3115。
- ⑮ 欧阳行周集十卷。别集类三,页3150。
- ⑯ 李北海集六卷附录一卷。别集类二,页3120。
- ⑰ 庾开府集笺注十卷。别集类一,页3110。
- ⑱ 河南集二十七卷。别集类五,页3198。
- ⑲ 忠肃集三卷。别集类九,页3275。
- ⑳ 孟东野集十卷。别集类三,页3152。
- ㉑ 同⑰。
- ㉒ 华阳集六十卷附录十卷。别集类五,页3204。
- ㉓ 云溪居士集三十卷。别集类八,页3256。
- ㉔ 鸿庆居士集四十二卷。别集类十,页3305。